

沈从文与刘敦愿

“窗前每天有十多支[只]黄牛来去，行步多十分庄严，为北方少见。远山环绕，积翠堆蓝，如一随时变化之王维画卷，所得实多。”1971年11月，正在湖北丹江受深刻教育的沈从文，给老友刘敦愿写来一封十一页五千余言的长信，叙说两年来辗转的住处，报告身心状况，请友好放心。

“后迁区中一贫农家中，另是一种格局，小小院子住八户人家。……南北大妈俱全。有小将十七位，一天到晚来来去去。大环境依旧，小环境真可说十分热闹，长夏为驱逐蚊蚋，保护牲口，有四户傍晚必各燃草卷一个，在房中不免略有猪悟能入蒸笼感。”

此后八页信纸，都是大暑炎蒸下，与老友探讨行雨乘云的龙。沈从文写道，来信所谈龙事，他也曾就常识所及，选取过约五百种不同龙形示例，想要做成文章，但后来搁下了。他尤其担心的是，自己二十年所学，终不脱“四旧”范围，不知龙凤是否近于佛经所谓毒龙。

1997年1月14日，病榻上的刘敦愿已不能说话，他向孩子要来纸笔，写下“龙与凤”三个字。之后便手颤无法握笔。很多题目还没有做，这张小纸片，刘陶交给了郑岩。

沈从文与刘敦愿的交往始于1950年后，刘敦愿为山大考古教研室筹建文物资料室，向身在历史博物馆陈列室的沈从文请教商量。

刘敦愿致沈从文信今或已不存，但沈从文的十数通复信，均得到保留。虽然也有过“我们热心太过，恐会犯错误”的担忧，沈从文在多封信中都以拳拳之心设想从文物认识祖国物质文化大略、从名物做文学与历史研究之途：

“到目前为止，教国文的教到‘执干戈卫社稷’时，干戈是什么样子，不知道也从不难受。教历史教到宋代海运河运用大量船只，船只是什么样子，不知道也并不难过。……大家都还停顿到这么一种旧式教学情形下时，我们着急也无用。只是得想法不要让年青一代再那么下去。……因为工人、战士和市中中小学师生，学明白历代劳动人民的成就，实在比看着旧文人字画有意义得多！有兴趣得多！”(1957年12月信)

◀ (上接5版)

到季节、夜晚这些概念，这些时间概念，在艺术史上都很重要。最近哈佛的汪悦进教授也在讨论这类问题。

刘先生很多文章通过十分敏锐的观察，讨论艺术形式的问题，但又试图在中国文化的内部找一些解释的道路。当然，他是很慎重的。有些问题今天大家才开始讨论，例如，把中国美术史从西方的概念中脱离出来，不能老拿西方的概念来套中国——这个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，而是说中国应该有自己文化内部的解释。刘先生那时已经开始认识到这类问题。

刘先生高明在哪里呢？在西方美术史界，一条是沃尔夫林(Heinrich Wölfflin)——巴赫霍夫(Ludwig Bachhofer)——罗樾——贝格利(Robert Bagley)，这条形式分析的道路，他们重视技术、重视对图像的分析，基本不谈太多意义方面的东西；还有一条是从瓦尔堡(Aby Warburg)到二战期间的潘诺夫斯基(Erwin Panofsky)等人倡导的图像学，他们志在将艺术史建立成一个人文学科，要和思想史、社会史做关联，因此就要谈意义。这两派在中国青铜器研究上很对立。刘先生对文献非常熟悉，知识面又广，同时还有艺术家敏感

精细的眼光，从他的研究来看，他跟西方整个的早期中国艺术史研究是暗合的，这可以证明他的学术判断之精准。但他又不在那些系统之内，他是孤军奋战。在相对封闭的学术环境中，他几乎以一人之力，与西方学术界关于中国早期美术史研究的系统并行，同时又超越其形式与意义之争。

所以我觉得他今天依然有价值，是西方的研究不能替代的。他是一位栖身于考古学界的美术史家，并且对于美术史学在中国向一个现代人文学科转换，有着重要的贡献。只是，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学科的壁垒，他的学术价值在其生前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；要到他去世二十多年后的今天，他在学术史上的意义才逐步显现。

为什么刘先生的研究在传统考古学里不被认可

方辉：刘先生对商周青铜器纹样的研究是青铜器研究回避不了的。当下大家围

绕青铜器的生产技术、物料的产地，还有作坊，以及自上而下的再分配体系等用力最多。这些都是从技术史、社会史的角度在看青铜器，从艺术史角度讨论的并不多。

为什么刘先生的研究在传统考古学里不被认可，是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在做年代学，也就是以地层学、类型学为基本方法的时空框架，刘先生就插不上手了。因为地层学、类型学的基础是在田野，在发掘者——自己亲手发掘出来的材料，通过自己的整理、排队，分出谁早谁晚。单纯的器物排队固然也可以排出来，也就是做形式分析，但没有地层检验，不知道是往哪个方向发展。像殷墟发掘的大部分东西是没有地层依据的，几乎就是通过艺术史的一个逻辑来给它排队，这样排出来也是可靠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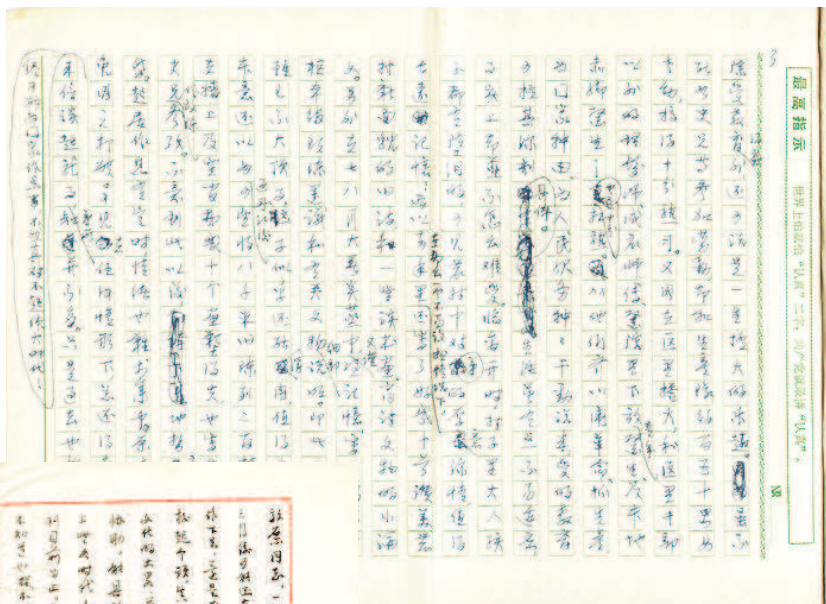
在1980年代以前，主流的黄河流域、长江流域考古，就是做年代学的建构。1980年代后，区系类型学说被奉为考古学黄金时代的典范，因为这一学说指导了当时的考古实践，解决了当时的时空框架问题。那时候科学院山东队和山东的考古学者，将山东地区的时间序列搞得非常清楚，非常有体系

。在全国范围内是遥遥领先的。但刘先生在这个领域缺席了，因为那时候他身体上已经不允许了，不可能再去领队，不可能再去野外了。恰恰在这个最热闹的地方，刘先生是阙如的，他没有参与讨论，没有参与建构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主流、非主流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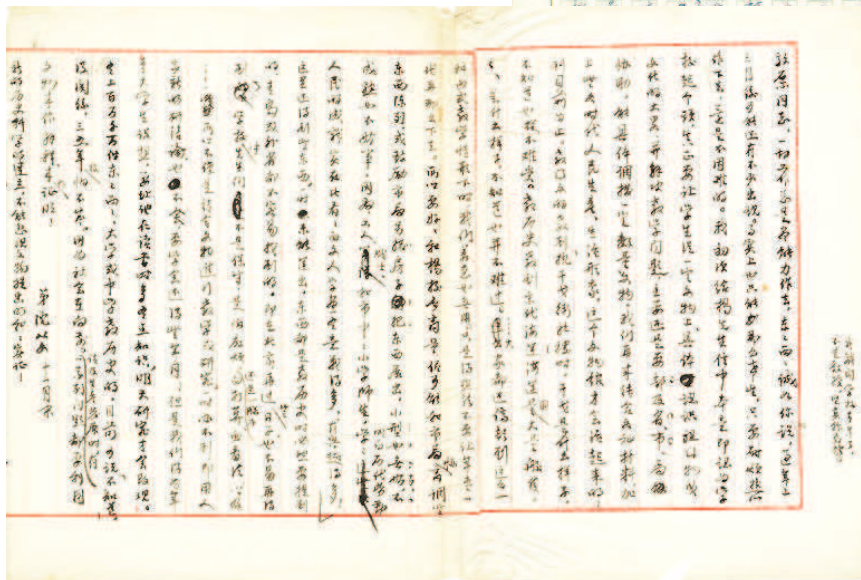
刘先生对此是很清醒的，所以他经常告诫年轻人要搞田野考古，而且要引导学生搞田野考古。因为他知道，西方考古学也有两个源头，一个是他所强调的古典美术史，另外一个就是田野考古，后者是从地质学上的地层学、生物学上的类型学发展出来的。中国考古学也基本是按照这个路径发展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学科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。

郑岩：刘先生是真正研究过考古学史的，他有史家判断的眼光，更有高度。说到学科发展的阶段性，我想我们其实很大程度上误读了傅斯年先生在《史语所工作之旨趣》里面的一段话：“我们不是读书的人，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，动手动脚找东西。”其实他说的我们

(下转7版) ▶



沈从文致刘敦愿信，1971年11月10日(局部)



沈从文致刘敦愿信，1957年12月未

“沈从文致刘敦愿书简三封”，王任、刘陶整理/注释，发表于《温故(之九)》；“沈从文致刘敦愿书信十封”，王任整理/注释，发表于《温故(之十四)》